

第壹章、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研究價值

一、研究動機與問題意識

閻連科，一九五八年出生於河南，一九八五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一九九一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二〇〇四年十月由解放軍二炮創作室調任為北京作家協會專業作家。閻連科於一九七八年開始寫作，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獄》、《最後一名女知青》、《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丁莊夢》、《為人民服務》七部；小說集《年月日》、《耙耨天歌》等；另有吉林人民出版社《閻連科文集》五卷和人民日報出版社《閻連科文集》十二卷。現為北京專業作家、國家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作協理事。曾獲文學獎如下：《受活》獲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優秀長篇小說獎」、第二屆鼎鈞雙年文學獎；以河南省愛滋村為題材的小說《丁莊夢》，被選為亞洲週刊中文十大好書；《堅硬如水》獲九頭鳥長篇小說優秀作品獎；〈黃金洞〉(中篇小說) 獲第一屆(1995-1996)魯迅文學獎；〈年月日〉(中篇小說) 獲第二屆(1997-2000)魯迅文學獎、第八屆小說月報百花獎、第四屆(1996-1997)上海優秀小說大獎；〈耙耨山脈〉(中篇小說) 獲第三屆(1994-1995)上海優秀小說大獎、首屆中華文學選刊優秀作品獎；〈耙耨天歌〉(中篇小說) 獲第五屆(1998-1999)上海優秀小說大獎；〈瑤溝人的夢〉(中篇小說) 獲第四屆小說月報百花獎、1990-1991 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夏日落〉(中篇小說) 獲 1992-1993 中篇小說選刊優秀作品獎；〈大校〉(中篇小說) 獲第八屆解放軍文藝大獎；〈朝著東南走〉(短篇小說) 獲 1999 年人民文學優秀作品獎；〈黑豬毛 白豬毛〉獲 2001-2002 年度小說選刊優秀短篇獎。¹

河南嵩縣田湖鎮耙耨山脈是長養閻連科的家園故土，河南的生活實況、民間記憶和文化心理為其文學創作提供豐富的養料和記憶資料庫，使其成為帶有濃厚

¹ 閻連科：〈附錄：閻連科作品獲獎情況〉，《閻連科文集(感謝祈禱)》(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2007年第1版)，頁391。

河南色彩和關注底層人民生存境遇的鄉土作家。五〇年代出生的閻連科經歷了中國農村經濟嚴重短缺的艱困時代，飽經貧困摧殘，深刻地體驗了農村農民受到諸種不公的對待，這不免使離開農村和吃商品糧成為閻連科的「宏偉」理想。一九七八年閻連科入伍後，因緣際會下開始寫作，無論從軍或寫作的最初動機皆是為了擺脫河南的貧困生活，貧困／淘金、離家／返鄉變成了閻連科創作的重要主題之一。一九八五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一九九一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軍藝學院文教系雖未規劃系統的文學養成課程，²但其間提供閻連科不斷地練習寫作的機會，對其日後創作有很大的幫助。閻連科認為其在汲取精神食糧的年代裡，卻只讀了《解放軍文藝》、《艷陽天》、《金光大道》等，致使寫作起點「非常低」，³因此閻連科如何自修閱讀自然對其創作有重要的影響。閻連科曾表示初讀《變形記》並不喜歡，但二〇〇〇年以後深受卡夫卡敏感的想像力的啟發，喜好的變易正反映在前後期的創作轉型，尤其是二〇〇〇年以後陸續發表的長篇小說，是充滿前衛想像力的現代主義或後現代主義特質的作品。除了卡夫卡以外，閻連科讀了威廉·福克納、加西亞·馬爾克斯、喬伊斯、博爾赫斯、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地方志、史料、民間傳說等，並曾表示這些閱讀書單不一定都能深受啟發，但筆者認為受到潛移默化的滋養和體悟是無庸置疑的。轉型後的閻連科除了受西方現代主義的洗禮，思索文學想像力和如何講故事來貼近真實的民間外，更有意識地運用豫劇、河南方言、河南風俗節慶於小說創作的題材、結構和語言中。其中，《日光流年》開始體現出豫劇的音樂節奏影響語言的表述方式，豫劇⁴是河南地方戲曲劇種之一，其演唱藝術的地域性特色，成為民間的生命、

² 「河南大學是 80 年代文憑熱時部隊出錢和學校辦的函授班，學歷是大專，入學雖然要考試，但有些初中、高中畢業的軍隊幹部沒有考上，有很多小學文化程度的領導都順利通過了考試。而畢業是皆大歡喜。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也是大專學歷，基本上是到校後上課的時間少，創作的時間多。在『軍藝』讀書的那兩年，對我的創作非常有幫助，但學習我就不知道應該怎麼說。比如現代文學史、當代文學史、歐美文學史，這對創作是多麼重要，可我在『軍藝』就沒有系統地學過。」閻連科：《閻連科文集·感謝祈禱》，頁 367。

³ 閻連科、梁鴻：《巫婆的宏筷子》（瀋陽：春風文藝出版，2002 年第 1 版），頁 93。

⁴ 「豫劇也稱河南梆子，是河南主要劇種之一，以唱功見長，唱腔流暢、節奏鮮明、吐字清晰、行腔酣暢淋漓，大開大闔，音樂豐富多彩，表演風格樸實，富有濃厚的鄉土氣息，觀眾人數在全國所有劇種中為最多。」李愛紅：〈論河南民俗文化與河南民間文化心理〉，《坪頂山

靈魂和集體的感​​情結構。河南是中原文化與戲曲中州韻的發祥地，河南方言的獨特性無疑在增添豫劇河南色彩中，扮演著關鍵環節的作用。閻連科是九〇年代以降豫軍作家中的生力軍，⁵其於河南文學的重要性在於：不再局限於宗法、血緣、權力的自傳性鄉土小說，⁶轉型為以鄉土中國為創作視域，創作出一部部以國家寓言為內涵、具有現代或後現代主義特質的河南色彩鄉土小說。例如，《受活》大量出現河南方言，意味著閻連科企圖創作出濃厚河南色彩和蘊含國家寓言的鄉土小說。

從五四新文學運動到八〇年代中國鄉土小說中的鄉土空間仍多處於靜態化農業社會的狀態，無論是悲涼的鄉愁或浪漫的田園牧歌的書寫，大多絕無後現代工業文明衝擊下所產生的巨大壓迫感。然而，從九〇年代以來，鄉土小說家已深刻地感受到科技文明和商業化不僅對自然生態的破壞，也促成人性的異化，無形地解構了原始道德形構的超穩定鄉土結構。⁷本文即是藉由閻連科早期至現今的創作歷程，梳理出鄉土小說如何由超穩定社會結構及靜態的人民生活狀況，轉變為交織出鄉土文明與城市文明碰撞和衝擊的社會人文景觀，並呈現為個體擺盪於鄉土空間、城／鄉空間、病理空間的情感張力。誠如陳雀倩所言：

學院學報》(2007年22卷4期)，頁86。

⁵ 梁鴻指出，河南於八〇年代湧現大批作家，如張宇、田中禾、鄭彥英、周大新、孫方友、楊東明、齊岸青、二月河等。河南文學於九〇年代處於高峰期，如李佩甫、劉震雲、閻連科、何慶邦、周同賓、李洱、張生以及許多更年輕的河南作家作品，經常刊行於大型文學刊物中。其中，劉震雲《一地雞毛》、《故鄉天下黃花》、《故鄉面和花朵》、李佩甫《羊的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皆曾引起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

⁶ 「河南當代作家在文學敘事中有一個普遍傾向，即熱衷於『關係』敘事。權力關係、人際關係、婚姻關係、血緣關係、宗族關係，……這些『關係』雖然為我們揭示了民族文明內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狀態，但卻因為作者的過分投入、過分的興趣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獨立的價值立場(並不是沒有)，沒有最終達成文本意義從『此岸』到『彼岸』的昇華。……這種對權力的『沉迷』與中原文化中的政治情結和作家生存背景有莫大關係。」梁鴻：〈「外省」：一個新的地域文學研究的理論視野——以20世紀河南文學為個案〉，《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年40卷2期)，頁106。

⁷ 丁帆等著：《中國大陸與台灣鄉土小說比較史論》(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1-16。參見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台北：谷風，1987年初版)。

中國社會「超穩定結構」中作為國家政治與意識型態仲介的農民，和書寫土地的知識份子兩者之間所形成的「鄉村論述」，是否可以作為當代「一體化」結構的載體之探討。……中國知識份子在試圖掙開內部的政治話語鎖鑰之餘，相應於西方話語和世界文學潮流等文化異己(the other)的侵逼與對照下，自覺的朝向一條返身民族文化與農村經驗找到「文化自我」認同的道路。⁸

本文聚焦至閩連科各時期鄉土小說中主體追尋自我／文化認同的演繹情形；國體影響主體形構或想像的家／國意識；病體與國體的隱喻內涵所展現的創傷記憶和生／死意識，進而建構出其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

本文由主體、病體、國體三個面向剖析閩連科身體書寫的精神結構和人文內涵，試圖結合身體和精神，而非身心二元對立分化的思想進路，以彰顯閩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⁹。換言之，本文藉由身體書寫考察閩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關注由主體、病體與國體所交織出的核心議題：鄉土空間中個體的存在意義、價值和方式，進而探究個體與鄉土、國家的互動中所萌發的心靈狀態，及其中所糾葛的歷史、政治、文化、慾望等複雜體系。陳曉明認為閩連科書寫身體乃出於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焦慮和恐懼，企圖將身體置於歷史中，並在歷史中思考身體，或以身體思考歷史。¹⁰身體匯具生物性存在和社會文化的混合特質，身體的

⁸ Liu Kang(劉康)，‘Subjectivity, Maxism, and Cultural Theory in China’ (〈主體性、馬克思主義與文化理論在中國〉)，‘Politics, Ideology, and Literary Discourse in Modern China’,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收錄於劉康、唐小兵編，詹明信序：《現代中國的政治學、意識形態和文學話語》)，pp.31-32。轉引自陳雀倩：《八十年代大陸文學主體性的建構與尋根意識的發展之研究》(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班，2006年)，頁5-6。

⁹ 傅科運用宗譜學進行討論的著作包括《性意識史》、《規訓與懲罰》，傅柯建立宗譜學是為了修正考掘學的理論，傅柯宗譜學的立論基礎可見於《尼采、宗譜、歷史》。參見米歇·傅科(Michel Foucault)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2001年初版7刷)；米歇·傅科著，楊遠嬰、劉北城譯：《規訓與懲罰》(台北：桂冠圖書，1992年初版)；米歇·傅科著，尚衡譯：《性意識史》(台北：久大，1998年初版)。

¹⁰ 陳曉明：〈身體的荒誕計畫——論當代小說中的「文革記憶」〉，輯入「歷史與記憶：中國現當

發展和變化深受政治、知識、權力、經濟、文化、空間等因素影響，身體的建構歷程中，無疑成為權力、知識和文化文本的重要載體。牽涉身體生成的諸多因素影響主體認同和主體價值的建構，因而本文關注在各種權力和知識的論述中，身體文本在規訓的身體和主體價值間產生複雜糾葛的辯證關係，其中涉及了主體與病體、病體與國體、主體與國體的對話體系。本文探究的「主體」(subject)，乃針對政治體制、歷史結構、道德規範、原始思維等如何在小說文本中呈現出鄉土中國錯綜糾葛的人性心理流變和文化認同的追尋歷程。主體在各種知識和權力的角逐中呈現為一流變的動態狀態——不斷地崩解和裂變，而非穩固恆常的存在。換言之，權力體系藉由知識體制或意識形態形塑了主體的精神，不僅達到操縱、干預和規訓身體的目的，亦使精神成了權力規範身體的產物和工具。個體在多元文化體系中形塑主體價值時，往往與病體、國體產生充滿張力的拉鋸狀態：個體的思維模式與國體的意識形態形成抗辯、衝突、磨合、協調、屈從等變動情勢。其中，當個體建立合於主流意識形態的主體價值時，主體也隨之失落和崩解，因此該劇烈的拉鋸過程正是本文關注的焦點。至於本文中「病體」，意指以身體出現疾病或生理現象來隱喻國家社會衍生的人文或歷史症狀；「國體」則是國家化身體或政體的隱喻——身體可謂是集個體和集體現象的複合性和多層性的議題。本文由閻連科鄉土小說所運用的身體隱喻或換喻捻出一條創作的精神系譜，誠如陳曉明所言：「只要看看閻連科的寫作史，那就是一部寫作的悲劇史，更確切地說是身體的寫作悲劇史。」¹¹與其評議為身體的寫作悲劇史，本文試圖強化的是身體寫作的精神史。閻連科透過身體寫作不斷地追問、思考和表述生存意義的問題，並探索一代人或國家體制的文化精神：追問人類的生存意義和價值；思辯死亡與自由的議題；體驗被拋棄和荒誕的人類生存境遇；描述各種生存的情緒，如焦慮、無聊、絕望、希望、異化等。因此，閻連科的鄉土小說不僅刻畫或冷峻地剖析個體的生存處境，亦思辯個體的信仰依歸，甚至代表了一種時代的精神狀況。

本文探究閻連科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旨在：勾勒出閻連科自一九七八年迄今

代文學國際研討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2007年1月4-6日)，頁10-28。

¹¹ 陳曉明：〈身體的荒誕計畫——論當代小說中的「文革記憶」〉，頁19。

所展現的創作精神史之外，也爲了凸顯主體、病體、國體的身體論述視角，呈顯閻連科由身體、權力思索歷史與鄉土的本質內涵，透過身體書寫鬆綁單一、禁忌、極權的國家體制和意識形態，從而交織出富含辯證性的精神系譜。身體是權力、知識和文化文本的載體，能展現心理感知、思考、意識和審美，呈現個體的精神存在狀態，攸關身體的關鍵詞——主體、病體和國體——無疑爲貫穿閻連科小說創作的核心宗旨。由精神系譜檢視閻連科的鄉土小說，旨在強化攸關複雜、幽微、細膩的心靈／精神領域，能與主體、病體和國體形構的身體書寫產生密切的對話關係，不僅顯示精神系譜與生命的本能慾望、權力的意志運作、身體的整飭規範密不可分，更能深刻地彰顯形塑身體隱喻的複雜體系。例如，歷史創傷、精神創傷或創傷記憶是聯繫身體和精神的重要語彙。主體、病體與國體是一多重交疊的關係，個體自我意識(主體性)如何由生物性身體展現，進而以病體、國體的轉喻或隱喻向度呈現出複雜的情感流轉，包括主體建構身分認同、國體影響主體形構或想像的家／國意識、病體與國體的隱喻內涵所展現的創傷記憶和生／死意識。此外，本文由鄉土空間、城／鄉空間、病理空間等空間視角進行論述，以期彰顯閻連科鄉土小說中鄉土文化和國家寓言的複雜意蘊。閻連科後期的小說更加複雜地將農村的鄉土空間影射爲富有政治內涵的鄉土中國，故而本文聚焦於討論病體與國體的辯證關係。

本文由鄉土、空間與身體的視角闡述閻連科小說中的存在意識，旨在揭示小說中體現出人存在的意義和方式，進而探究個人與世界的關係，包括鄉土空間中呈現的身分認同、鄉／城空間中流動的家／國意識、病理空間所展演的生／死意識。閻連科小說創作成果十分豐富，筆者認爲儘管閻連科小說的類型或主題極具多樣性，但存在意識乃其小說創作的一貫宗旨和精神，故本文試圖由鄉土、空間和身體三向度爬梳閻連科小說中展現的存在意識。存在意識是考察人類精神向度的途徑，在自然、文明、歷史、現實等外延因素構築的巨大網路裡，當人處在絕望、孤立、瘋狂甚至是殘酷的世界時，人以怎樣的精神和方式生存？人爲了活著，可以犧牲什麼？尊嚴、情感或親人嗎？掙扎地選擇什麼被犧牲，或以什麼方式犧牲，皆能深刻地反映出人的生存意識。因此，閻連科創作的一貫宗旨之一，或許可引用法國印象派畫家保羅·高更(Paul Gauguin, 1848—1903年)的一幅畫名：「我們從何處來？我們在哪裡？我們向何處去？」(D'où venons-nous ? Que

faisons-nous ? Où allons-nous ?)，¹²高更的三個質問表達了對自我的質詢，叩問歷史根脈、尋找立足點、確認方向感的迫切需要。誠如《日光流年》前言揭示出意圖尋找人最原初的存在意義，此於《受活》、《丁莊夢》或中短篇耙耨系列如〈年月日〉、〈耙耨天歌〉等，皆是閻連科一再與自我生命對話的重要議題。

本文主要從鄉土、空間與身體三向度切入，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的存在意識，乃緣於空間是生發人類身體經驗和自我認同的重要維度。依莉莎白·葛洛茲(Elizabeth Grosz)主張身體作為社會文化銘刻(inscription)的位置和場所，當可視身體為社會文化的產物。¹³喬安妮·恩特維斯特爾認為空間對於個體來說兼具外在和內在的雙重特質，前者意指空間將一些特殊的規則和模式強加於個體，後者則是空間被個體所經驗並且也被個體所轉換。¹⁴身體是社會身分的載體，個體藉助

¹² 一八九〇年代高更移居南太平洋的小島——大溪地(Tahiti)，一八九七年高更畫出生平最大幅的經典作品(高 1.5 米×寬 3.6 米，139 x 374.5 公分。油彩·畫布。收藏於美國波士頓美術館 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 D' où venons-nous ? Que faisons-nous ? Où allons-nous ? (Where Do We Come From ? What Are We ? Where Are We Going ?) 該畫描繪生老病死的循環，包括個體的起源、身分和宿命。此種對人的關懷，更連繫著宇宙的命運：溯及生命的早期形式及初始生命，再回溯到原生宇宙中合成的元素，乃至更早之前飄浮在空間中的縹緲能量。維納齊亞諾(Gabriele Veneziano)著，林世昫譯：〈時間有沒有起點？大霹靂，真的是時間的開端嗎？〉，刊載於「科學人雜誌網站」。http://www.sciam.com.tw/read/readshow.asp?FDocNo=463&DocNo=740 (2007/3/02)。下文關於高更畫作的簡介，轉引自波士頓美術館的網頁：Gauguin's great painted "testament" of 1897-98, Where Do We Come From? What Are We? Where Are We Going? was inspired as much by the artist's vision of Tahiti as by his intense personal suffering. Determined to end his life after its completion, Gauguin infused this self-proclaimed masterpiece with eternal themes of life and death, religion, and fate. http://www.mfa.org/exhibitions/sub.asp?key=15&subkey=542 (2007/03/02)

¹³ 「我們因此可以重新檢視和質疑生物學與文化之間的區別，探索文化利用自身的形貌來建構生物秩序的方式，以及心理與社會如何刺激和製作身體。所以，我們的興趣是探究身體在心靈的、社會的、性慾的、論述的或再現的方面，被生產出來的方式，以及換個方向，探究身體如何將自身重新銘刻和投射在其社會文化環境裡，使得環境同時產生與反映了身體的形式和利益。」依莉莎白·葛洛茲(Elizabeth Grosz)著，王志弘譯：〈身體——城市〉，輯入王志弘編譯：《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台北，1995年初版)，頁 210。

¹⁴ 「對人類學家馬賽爾·莫斯來說，身體是被文化塑造的，……『身體的技術』，那是『從社會到社會男人(sic) 知道如何使用其身體的方式』。這些身體的技術是個體進入文化的社會化過程的重要手段：確實，身體是一種工具，藉助身體這個工具，個體才能在一種文化中認知和

身體才能在文化中有所認知和生活。易言之，身體如何將自身重新銘刻和投射在其社會化環境裡，使得環境同時產生與反映了身體的形式。因此，檢視形塑身體的外在因素和身體如何納入(embodiment)為建構空間的要素，二者並非對立，而是相輔相成、互為表裡的關係。空間是以自然的地理形式或人為的建構環境為其基本要素，且以此為基，人的各種活動不斷地豐富空間的內容，例如意識形態、政經條件、宇宙觀、宗教信仰、文化觀念和個人實踐等。黃應貴認為物質性空間與人的活動相互結合，產生各種象徵空間時，例如神聖空間等，隱喻(metaphor)或換喻(metonymy)的意念機制便發生作用。換言之，人在物質空間裡的基礎活動中建構了社會關係的空間和文化習慣的空間，參與者的身體也納入(embodiment)為建構空間的一部份，人體本身的各種象徵，如性別、年齡、社會階層、輩分、權力等，都會影響空間組織和空間趨向。¹⁵畢竟，人類是被賦予形體的主體(embodied subjects)，人的肉體是個場所(site)，在此場所中，構成了性別(gender)、性徵(sexuality)、種族、族群、階級、意識的差別。道格拉絲(Mary Douglas)認為依據人類學的研究傳統，身體如同一個文化文本(body as a culture text)，反映文化價值觀及某特定文化所關注的事物。格拉斯在《純潔與危險》(Purity and Danger)中指出了身體扮演社會象徵的方式，並主張「身體是個模型，它可以代表任何一個有限制的系統」。¹⁶透過象徵想像社會關係與社會過程，象徵體系在任何的特定文化中，人類肉體被感知和再現的方式，反映該文化所關注的事物。總之，特定的地理、建築、城市等空間化的場域，是身體的社會建構裡的特殊成分。依莉莎白·葛洛茲(Elizabeth Grosz)表示空間的形式、結構和規範滲入和影響了構成身體和主體性的其他一切要素裡，因為空間影響了人在其中的生活方式，並由此影響了人的舉止和身體的方位。¹⁷因此，本文檢視閩連科小說中政治、社會、文化環境如

生活。」[英]喬安妮·恩特維斯特爾著，皓元寶譯：〈給身體定位〉，《時髦的身體——時尚衣著和現代社會理論》(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初版)，頁11。

¹⁵ 黃應貴：〈空間、力與社會〉，輯入黃應貴主編：《空間、力與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研究所，1995年初版)，頁1-32。

¹⁶ Kathryn Woodward 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頁180-182。

¹⁷ 依莉莎白·葛洛茲(Elizabeth Grosz)著、王志弘譯：〈身體——城市〉，輯入王志弘編譯：《空間與社會理論譯文選》(台北，1995年初版)，頁210-217。

何形塑人民生理、行爲和情感的身體，作為文化文本的身體又如何作為反映社會、政治或文化現象的象徵符號，此中所展現的存在意識乃本文聚焦所在。

簡言之，本文第貳章討論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書寫時，著重鄉土空間中的地理景觀、農民的生活方式和存在意識，並凸顯養育閻連科成長的河南鄉土色彩，包括河南的鄉情民俗、俚語方言和喪葬儀式等鄉土文化。本章論述了宗法對身體的束縛、鬼魅身體的敘述策略、民間風俗對屍體的安置等，並試圖進而由國族寓言的視角論述身分認同。第參章則著重在鄉／城兩個對照性的空間裡，政治(權)、經濟(財富)、兩性慾望影響村民面對家／國時所產生的意識流變情形，此中涉及政治身體、情慾身體、商品化的身體在鄉／城的空間疆界中擺盪和游離的狀態。第肆章以「病理空間」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特殊的文學現象。閻連科鑑於黨國施政深刻地影響人類的生存狀態，以病理空間象徵由病態國體的暴力施政造成鄉土中國的精神創傷。例如，形塑丁莊、受活村、三姓村等集體罹患疾病的村莊，作為國家寓言中鄉土中國的縮影。特定村莊中集體性的罹病，不可單純視為單一區域的特殊現象，而應思索支撐或支配該區域的政治、文化或慾望空間的影響力，以及疾病在支配性空間中所彰顯的社會狀態、文化變遷、心理轉折等象徵或隱喻功能。疾病使身體處於生理的非常狀態，在時間的無情催逼下，迫切性地面對生死，此中反映的存在意識乃複雜地糾葛著政治、文化、慾望、知識價值等體系。閻連科疾病書寫的修辭策略和主題意蘊實質企圖破譯環繞在疾病中的各種想像與寓意，既承繼剷除國民性病根的五四文學，也有創造性的轉化。

二、研究範圍和研究價值

閻連科在大陸是備受關注的當代作家，關於其創作的相關評論亦相當豐碩，但台灣學界的研究則相當稀少，目前並無學位論文或期刊論文關注閻連科的創作，故閻連科小說研究在台灣仍有許多待開發和研究的空間。台灣出版界至二〇〇五年才開始發行閻連科的小說，截至目前僅出版三部長篇小說：《為人民服務》、《丁莊夢》、《受活》，顯示台灣出版界長時間以來並未關注閻連科，但可喜的是發行的三部長篇小說中有兩部是涉及敏感議題的大陸禁書——《為人民服務》和《丁莊夢》，因前者描寫小兵和師長夫人的亂倫關係，後者則以河南愛滋

病村為創作題材，中共當局認為創作內容不當，故於小說上市後，緊急勒令撤架回收。

本文試圖探析閻連科截至目前的所有作品，因為即使大陸學者十分關注閻連科的創作，但多半局限於耙耨山系列的中短篇小說乃至近年的長篇小說，但耙耨山系列之前的瑤溝系列、和平軍旅和東京系列¹⁸小說的研究仍有待耕耘。儘管瑤溝系列或和平軍旅小說是閻連科較早期的創作，品質較為參差不一，但仍有值得研究的價值，因為由閻連科早期以來的創作為研究起點，可見其創作至今的變與不變。

閻連科出身農民，對社會底層人民和土地有著無法割捨的情感，因此對農民的思想觀念、心理情感具有透徹的體認。閻連科的鄉土情結是複雜的，一方面批判鄉土陋習，另一方面則是對鄉土的眷戀。林舟主張一九八八年閻連科發表〈兩程故里〉展現了其對農村社會的深切關懷，故而開始受到較廣泛的關注。九〇年代以後，雖仍創作大量的軍旅小說，但還是關注農民軍人離開鄉土與尋找原鄉等議題，「在一定意義上是地域文化小說創作的自然延伸」。¹⁹而且，從〈瑤溝人之夢〉、〈歡樂家園〉到〈年月日〉，乃至於近年的長篇小說《受活》等，皆以虛擬的瑤溝或耙耨山為創作的地理空間，描述農民的道德意識、世界觀和情感表達，故鄉土貫穿了閻連科小說的血脈，也是其創作的成就和特色。

¹⁸ 閻連科於一九八六到一九八七年將四部中篇小說〈橫活〉、〈鬥雞〉、〈芙蓉〉、〈名妓李師師與她的後裔〉輯結成「東京九流人物記」系列，「東京」——河南開封——作為其創作時文學想像的都市，此靈感來自某日於書店無意間購得了記載人物小傳的開封文史資料。閻連科擴寫《汴梁瑣記》中一千多字的魯耀小傳為三萬餘字的〈橫活〉。閻連科雖側重於「九流人物」的刻畫，但仍不失生動地描繪了東京的市景風俗畫，並鋪排了東京市街和建築的空間安置，頗具古典小說《東京夢華錄》的況味，該系列不同於瑤溝、和平軍旅、耙耨系列的鄉土關懷，但仍可由小說中觀察出其一貫塑造人性的世故和圓熟的筆法，是閻連科迄今創作中較另類的作品型態。東京九流人物記系列源於偶然的創作啟發，將市井風物、民俗風情、九流人物鑲嵌到中國歷史的變遷演義中，具有較濃厚的傳奇色彩，檢視該系列可知閻連科早期創作已展現了人物刻畫和架構小說的藝術水平，但因該系列創作為擴寫或改寫文史資料的初試啼鶯之作，較不能體現閻連科主要的文學理念。閻連科：《巫婆的紅筷子》，頁 36。

¹⁹ 林舟：〈鄉土的歌哭與守望〉，輯入閻連科：《歡樂家園》（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年初版），頁 1。

鄉土小說是中國二十世紀以降的小說創作景象，從魯迅筆下浙東人種、環境、文化、風俗等發端，如《阿 Q 正傳》、《祝福》等，奠定了五四小說的重要型態之一，又如沈從文的《邊城》、《蕭蕭》亦皆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創作而形成鄉土文學的傳統。丁帆認為後文革時期的尋根文學，如韓少功《爸爸爸》、《小鮑莊》、莫言《透明紅蘿蔔》等，雖是五四傳統影響下而繼承鄉土文學傳統，但尋根文學僅片面地挖掘民族劣根性，故仍有所侷限。²⁰人與土地的關係、鄉土人情是閻連科一貫的創作宗旨，因此閻連科的小說如何承繼五四傳統，又能有所轉化與創發，是閻連科小說價值所在和應該研究的層面。

因此，本文第貳章繼承前人研究的觀點分析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情結，嘗試從「身分認同」的角度分析小說中的存在意識，以期深刻地彰顯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精神，及其中試圖挖掘的鄉間社會的生存本相，此乃本文繼承前人研究成果和企圖有所轉化的部份。此中涉及：鄉土社會中由宗族、風俗信仰形成的超穩定結構，如何規範村民的身體？村民如何在規範下，以身體來建立自己的群體與其他群體的差異，進而形塑自我認同？誠如《身體與社會》指出，理解個體所屬的文化體系之特殊性為何，才能了解鄉土文化如何認識、形塑、運用和影響身體，尤其，鄉土文化如何界定什麼行為能夠凝聚群體認同，身體表現行為時又表達或挑戰了何種型態的文化機制？²¹因此，本文第貳章以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為地理體系，例如豫西耙耨山脈，闡發鄉土空間如何規範身體，身體如何建立身分認同，此中反映什麼文化或心理特質。

至於第參、肆章則擴大鄉土中身分認同的向度，進而探究身體作為移動的載體在鄉／城空間中如何萌生家／國的意識流變，以及病理空間展現的生／死意識和歷史創傷。許多學者認為閻連科的鄉土小說雖有其價值和獨特性，但仍失於過度封閉在鄉土中，侷限了其創作的視野和豐富性。例如梁鴻提出對立的價值判斷：即使耙耨山裡的村莊貧窮或有人際壓迫的黑暗面，卻仍能依據宗法或道德秩序自足地生存著，但外部世界的文明入侵後，使耙耨山失去原有的穩定性，甚至

²⁰ 柳建偉：〈立足本土的艱難遠行——解讀閻連科的創作道路〉，《小說作家作品研究》（1998年2期），頁30-35；丁帆：〈總序——新時期地域文化小說叢書〉，輯入閻連科：《歡樂家園》，頁1-15。

²¹ 楊儒賓、何乏筆主編：《身體與社會》（台北：唐山出版社，2004年初版），頁93-134。

陷入災難中，故村莊雖封閉、苦難，卻充滿原始烏托邦的夢想。²²儘管筆者不否認閻連科的小說確實凸顯了城市或外部世界的文明對人性造成的異化現象，但是否把縷山脈便可簡單化地作為烏托邦的象徵？實際上，閻連科的小說著墨更多的是，城市文明如何對鄉村造成影響？村民在各種文明欲望的入侵下，如何應對？閻連科鄉土小說中的城和鄉二者間的道德、權力、慾望皆充滿了張力和拉鋸的辨證關係，並不能僅純粹地以村莊是孤立封閉而溫馨的烏托邦，城市則是腐敗的來源，作為化約性的結論。因此，本文第參章由鄉／城空間中的流動性和互動關係來梳理閻連科的鄉土小說，應能有更具豐富意涵的研究成果。易言之，就空間面向而言，鄉土空間、鄉／城空間、病理空間分別反映的身分認同、家／國意識、生／死意識，是多面向和多層次地豐富了研究閻連科小說中存在意識的視角。就身體層面而論，身體不僅是定點在閉鎖的鄉土中求索歸屬或身分認同，身體在鄉／城空間中的移動讓人的存在感具離散和回歸的流動性，至於疾病導致生／死關頭的迫切性尤其是閻連科近期長篇創作的重要命題，如《日光流年》中三姓村集體罹患活不過四十歲的喉堵病、《受活》中受活村是殘疾人士的聚集地、《丁莊夢》描述爆發愛滋病的故事。故本文由鄉土、空間與身體三向度論析閻連科小說，當能深入掌握其中所呈顯的存在意識和精神意蘊。

此外，多數學者將閻連科長篇創作，如《受活》、《日光流年》等，評議為超現實寫作或現代現實主義，超現實創作意指具有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反叛和超越，此中涉及超現實寫作如何進入大陸當代小說界。五四時期，施蜚存雖引進和試驗西方超現實主義，但當時僅具有「純文學」和唯美的特質，並不關心對社會的批判和人的解放等可能性。後文革、八〇年代裡的創作家，不能滿足於過往長期服膺於社會主義而教條化的現實主義創作，轉以超現實主義打破現實主義的枷鎖，成為一股文學潮流，如尋根文學和先鋒文學，為大陸當代小說史上的一大解放。誠如閻連科所言：「我想我們不得不用非寫實的手法，不能不用超現實的寫作方法。只能用非寫實、超現實的方法，才能夠接近現實的核心，才有可能揭示生活的內心。」²³不僅如此，《受活》中運用地方方言、俚語俗語或絮言在語言和結構

²² 梁鴻：〈當代文學視野中的「村莊」困境——從閻連科、莫言、李銳小說的地理世界談起〉，《文藝爭鳴》(2006年5期)，頁76-81。

²³ 〈超現實寫作的重要嘗試——李陀與閻連科的對話紀錄〉，《受活》，頁458-463；張瑜：〈現代

上具有嘗試和獨創的審美意義，誠如閻連科所言：「我個人非常重視小說的語言和結構。……一個好的故事，肯定有一種好的結構跟它相匹配，肯定只有一種好的語言跟它相匹配。」²⁴例如，《受活》中受活、儒妮子、哩啲啦呀等豫西方言的大量使用達到語言陌生化的效果，質樸中不失語言在藝術上的飽滿和敏銳度。此外，以絮言說明方言土語，或將歷史事件、民間傳奇、風俗等安置於絮言裡，作為正文的注釋，不僅產生時空穿插的效果，更在結構上製造出了一種「中國盒子式」的審美特色——一層中國式的盒子裡仍包裹著層層盒子，「最終取出一個盒子來」。²⁵閻連科以中國盒子比喻《受活》的結構，筆者認為或許以「多寶格」勾勒《受活》的結構會更生動。因為，多寶格是一種妥善利用空間的工藝作品，箱蓋中有盒、盒中有套匣、套匣中又有屨，賞玩多寶格繁複精密的結構時，產生了輾轉曲折、尋尋覓覓的趣味，當能貼切地詮釋《受活》複雜結構的趣味和價值。因此，閻連科在創作方法上的創造性在現當代文學作品中極具價值和意義。誠如《受活》的獲講辭：

這是一部以極端荒誕的方式反應農村社會生存狀態和精神狀態的作品，是一部以崎嶇的想像構成的具有探索性的實驗性的作品。小說對荒誕心理和行為的書寫，既真實生動又出人意料。從某重意義上說，它是一部獨特的民族精神史，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小說對本土文化資源的開掘和書寫，為文學創作的民族化提供了重要的經驗，在文學觀念日趨駁雜和消費文化崛起的時代，作品的深度和意義追求，使它當之無愧地成為一部優秀之作。

26

現實主義：閻連科《日光流年》，《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年12期25卷)，頁98-101；劉海梅：〈對傳統現實主義的反叛和超越——兼論閻連科及其《受活》〉，《作家作品研究：理論與創作》(2004年第5期)，頁103-105。

²⁴ 閻連科作客新浪網訪談實錄中的〈找到了一個「中國盒子式」的結構〉。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0813733_yanlianke/2.shtml (2007/01/27)

²⁵ 閻連科作客新浪網訪談實錄中的〈找到了一個「中國盒子式」的結構〉。

http://book.sina.com.cn/longbook/1080813733_yanlianke/2.shtml (2007/01/27)

²⁶ 閻連科：《受活》封底摺頁。

因此，閻連科的小說議題既具傳統特質(鄉土文學的傳承)，又能關注當代議題，更在小說形式上進行實驗性的嘗試，故本文在梳理閻連科小說的生存意識之餘，亦嘗試探討閻連科在現當代文學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啓發意義和重要性。

第二節、研究方法與架構

一、研究方法

(一) 神話與人類學²⁷

閻連科鄉土小說常涉及神話思維，舉凡太陽神話、泥土、毛鬚、大地子宮、洪水、再生與回歸或交感巫術的原始思維，此中顯示的存在意識為本文的切入視角之一。王鴻輕認為神話的意象出現在新時期小說中十分引人注目，尤其是八〇年代中興起的尋根文學，乃至近年的小說創作中神話意象仍層出不窮，如賈平凹《廢都》、韓少功《爸爸爸》、蘇童《我的帝王生涯》、王安憶《紀實與虛構》等，皆關注了人的情感、精神和存在的本質力量，以期深化和昇華作品的現實意涵。神話涵融著民族的生命意義和和情感狀態，在社會發展中淵遠流傳。²⁸誠如卡西

²⁷人類學對十九世紀以降的人文社會科學產生巨大影響的新興學科。神話理論是人類學知識系譜中重要的組成部分。幾乎所有的人類學流派以及重要的人類學家都在神話研究領域留下大量的研究成果。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曾主張人類學應當成為整個社會科學的基礎。人類學以研究無文字社會的原始社會為主要任務。馬林諾夫斯基的學說強調的是文化人類學。馬林諾夫斯基認為神話的功能：「神話總的來說也不是關於事物或制度起源的、毫無價值的一種臆測。神話絕不是幻想自然，並對其法則做出狂妄解釋的產物。神話的作用既非解釋，亦非象徵。它是對非凡事件的陳述，那些事件一勞永逸地建立起部落的社會秩序、部落的經濟活動、藝術、技術、宗教的和巫術的信仰與儀式。我們不能簡單地把神話視為文學作品裏的、活生生的、很吸引人的虛構的故事。神話論述了寓於社會群體的制度與活動中的根本現實，它論證了現實制度的來龍去脈，提供了道德的價值、社會差別與社會責任，以及巫術信仰的可追尋的模式。這一點構成了神話的文化作用。」[英]馬林諾夫斯基著：〈巫術與宗教的作用〉，輯入史宗主編：《20世紀西方宗教人類學文選》(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第1版)，頁96。

²⁸ 王鴻輕：〈回歸中的現代性追求——新時期小說神話原型的價值取向〉，《文藝評論》(2001年3月)，頁76-80；王輕鴻：〈論新時期小說中的神話異象演化〉，《荊門職業技術學院學報》14卷5期(1999年9月)，頁23-28。

爾《人論》所言：「神話的真正基質不是思維的基質，而是情感的基質。」²⁹王一川梳理了西方原型理論後指出：「如此說來，追問原型，就絕不是單純出於理論興趣，而有更深的意向所在——弄清藝術體驗的本根，弄清人的存在的本根。」³⁰閻連科小說於形塑鄉土時，關懷或批判了農民、底層民眾的生存狀態，從〈瑤溝人的夢〉的瑤溝系列，到耙耨山系列，如〈年月日〉中先爺的形象，皆反映閻連科小說中一再探尋鄉土社會中人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誠如閻連科所言：「我希望我的創作充滿疼痛」、「我對土地的愛和關注，是永生不會改變的。不過愛的方式不一樣了，以前就是愛，現在愛裡充滿著恨。恰恰充滿著恨使這樣一種愛非常深刻。」³¹閻連科小說中塑造了充滿荒誕、絕望又不失真實感的鄉土，在痛苦裡讓讀者思索人與世界的關係，和人最原初的存在意義。列維·斯特勞斯於《原始思維》中論及：「如果我們承認，最現代化的科學精神會通過野性的思維本來能夠獨自預見的兩種思維的交會，有助於使野性思維的原則合法化並恢復其權利，那麼，我們仍然是忠實於野性思維的啓迪的。」³²由此可見，新時期小說中神話思維的滋生不啻是回歸，更是現代意義上的超越。因此，本文第肆章的部分論述由神話、人類學的觀點出發，是切入閻連科小說精神的最佳途徑之一。

(二) 疾病書寫

疾病誌(pathography)乃敘述疾病、治療、死亡的個人經驗，醫學人類學者凱博文(Arthur Kleinman)名之為小型的民族誌(ethnography)。當代疾病書寫的文體、敘事隱喻與傳統疾病誌無大差異，皆採取神話想像式的象徵和隱喻，如困頓的旅程、航行與漂泊等為疾病誌的原型。易言之，疾病書寫是以疾病為本體或以病人

²⁹ 卡西勒(Ernst Cassirer)著，甘陽譯：《人論——人類文化哲學導引》(台北：桂冠圖書，2005年再版)，頁200。

³⁰ 王一川：《審美體驗論》(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92年初版)，頁284。

³¹ 羅雪揮、榮郁、閻連科：〈閻連科：我希望我的創作充滿疼痛〉，《中國新聞週刊》(2006年5期)，頁77-79。

³² 路先·列維-布留爾(Lucien Levy-Bruhl)著，丁由譯：《原始思維》(台北：台灣商務，2001年初版)。

為敘述對象的文體。疾病不但指稱外在病源進入病人的體內，更可由疾病觀照個體內在或社會的縮影。因疾病成為書寫對象時，不僅彰顯了人面對疾病的心靈活動，更涉及其中所潛伏、涵藏的巨大力量——龐大的社會性架構或文化內涵。因此，李宇宙認為疾病的述說不只是關於(about)病痛的故事，而是透過(through)個體或文化創傷後的身體重新發聲(voice)。凱文博關注身體的文化形式(culture form)及其在不同時空下的表現，作為文化的客體，如何再現身體與文化間的互動關係，須由疾病和症狀的語言證實。³³閻連科小說的疾病書寫是以疾病患者透過陳述來建構自我、重新追尋「我的自己」(My-Self)的過程，由疾病衍生的情感意識是根植於人類的生存本能，並積澱在人類文化經驗中的深層情感。疾病雖是生理現象，但在生理的痛苦和心理的壓抑中有人類文化的折光，因此疾病書寫具有耐人尋味的文化意蘊和審美意象，極具研究的價值。

疾病文學乃文本中出現疾病的描述，如疾病形象、罹病者與醫病者間的關係等，不僅止於個人抒懷，還交疊了病人的心理、生理、個性，乃至於文化、社會與政治，使醫學不僅孤立於科學、臨床醫學層面。由疾病考察藝術或文學中常見的人類問題、經驗、情感、生理、心理或幻想，不應混淆文學的典型性與醫學的現實性。波蘭特認為文學以藝術形式發表對疾病的見解及補充自然科學的觀點，而非反駁自然科學，因而以疾病作為文學題材，不僅豐富人類存在的知識，更作為象徵，以說明個體生活脫離原本的狀態，且與其周圍的關係變得特殊，不再是正常和理所當然。³⁴研究瘋癲、疾病、犯罪等的米歇爾·傅柯，極為認同巴黎高師同學、著名科學史專家康吉蘭(Georges Canguilhem)於《正常與病態》(le normal et le pathologique,初版於一九四三年)指出：「正是變態(the abnormal,不規範的)引起人們對常態(the normal,合規範的)的理論興趣。規範(norm)只是通過這種偏離才得以確認。功能只是因被破壞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過不適應、受挫和痛苦才升華到關於自身的意識和科學。」³⁵因為疾病使得正常人的常態(the normal)生活

³³ 李宇宙：〈疾病的敘事與書寫〉，《中外文學》（2003年31卷12期），頁49-67。

³⁴ [德]波蘭特：〈文學與疾病——比較文學研究的幾個方面〉，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9年初版），頁256-272。

³⁵ 詹姆斯·米勒(Miller, James)著，高毅譯：《傅柯的生死愛慾》（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初版二刷）；李銀河：《福柯與性》（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初版），頁44。

資格被取消，故由「變態」(the abnormal)的視角切入，當可見證、探詢生命的意義與價值。³⁶值得思索的問題是：疾病書寫是否顯示生病狀態或書寫者與社會關係發生偏離？偏離是疾病的本源嗎？或疾病成爲個體與社會關係變化的原因？由此，疾病書寫的功能不僅揭示個人與社會關係發生變化，甚至藉由疾病書寫也演示了疾病在傳統關係中發生變化，因而社會不得不接受的特殊狀態。例如，患者面對病症的心理行爲方式不同於傳統的既定認知和心態等，由此顯示出疾病主題的歷史演變及其中反映的心理轉化，乃至於文化或政治變遷。

疾病書寫的作家包括患病作家、醫生作家、作家作爲醫生。³⁷其中，作家以醫生的診斷眼光，由個人肉體的疾病，擴及至社會機體內的疾病。即使未能開方治病，至少試圖彰顯「疾病」的缺陷和弊端。中國現代文學之父魯迅棄醫從文，探索中國國民性的病因。〈我怎麼做起小說來〉申明：

說到「為什麼」做小說吧，我仍抱著十多年前的「啟蒙主義」，以為必須是「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多採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³⁸

魯迅棄醫從文肩負啟蒙的重任，企圖醫治人類心靈，剷除國民性中的病根，療治民族精神痼疾，喚醒阿 Q 式的國民，使之成爲狂人式的戰士。繼魯迅後，巴金、老舍、曹禺、郁達夫等自覺地肩負起改造國民靈魂的重任，由人權、社會不公等

³⁶ 王應平：〈疾病、愛欲與文學生產——以《沙床》爲例〉，《當代評論》，頁 57-58。

³⁷ 疾病提供患病作家非凡的創造力；醫生兼作家則將臨床上的醫學專業運用到文學中。至於作家作爲醫生乃作家視自己爲醫生，目的有三：其一是以助人者的形象出現在讀者面前，其二則將診斷的目光拓展至社會機體內的疾病。此外，作者透過文學創作獲得自我克服疾病或錯亂的方式，並由作品傳播出去。葉舒憲主編：《文學與治療》(北京：社科文獻，1999 年第 1 版)，頁 257-260。

³⁸ 幻燈片事件：「這一年學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爲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緊要的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爲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爲當然要推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1981 年初版)卷一，頁 416-417。

批判國民的弱點，如以洋奴或民族的敗類等精神貧血患者，揭示人性弱點和醜惡，以及人的沉淪和墮落。相對地，車紅梅認為瘋子、精神妄想症的形象則是能深刻地體現具有著獨立思考能力的「真人」，揭露社會歷史的面紗，顛覆和質疑構成社會倫理道德規範的話語，企圖尋找生存的意義。³⁹換言之，五四時期，中國現代作家群體性地呈現了魯迅式民族醫生的抱負，將文藝視作診斷或改變民族痼疾和精神的利器。魯迅棄醫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極具典型性和指導性，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許多作家投入到文藝啓蒙陣營中，如郭沫若、郁達夫皆放棄醫學院轉而從事文學創作，但學醫的基礎和經驗仍對其文學創造影響甚鉅。簡言之，魯迅作為民族醫生的使命不僅影響中國現代作家，也形成了五四文學的啓蒙傳統和改造國民性的主題，故大量地運用各種疾病的意象，如鮮血、肺結核、吃人、瘋狂、精神病、死屍、藥瓶、難產、血泊、嚎叫等發揮了疾病的象徵和隱喻功能。人物的病體是病態社會的象徵，生病導致的死亡隱喻著舊社會制度的崩潰和舊文化精神的衰落。

承上，閻連科疾病書寫的修辭策略和主題既承繼五四文學，也有創造性的轉化，作家企圖破譯環繞在疾病中的各種想像與寓意，不僅關照疾病的生理病症，更以隱喻的創作方式為疾病增加文學想像，賦予其附加意義。換言之，「疾病情結」來源於作家人生體驗和個體的痛切感受，創作與作家的精神創傷或心理經驗有關，作家透過疾病書寫，用以宣洩社會壓抑或提出批判性的考察。例如，以疾病隱喻廣泛地揭示政治形勢的混亂與腐敗，疾病成為死亡的變形，作為對社會的抗衡，進而喚起民眾對自身命運的關注。因此，本文第肆章由疾病隱喻的視角探詢閻連科小說中疾病書寫的豐富意蘊。

(三) 身體、空間與記憶、權力

本文第肆章由疾病隱喻切入，闡發閻連科小說中的存在意識，其中的部份論述由傅柯(Foucault, Michel, 1926-1984)的權力、話語與身體的辨證關係為基點，例如閻連科疾病書寫中血的隱喻、夢的象徵、狂人、殘疾陽具等修辭策略，批判或

³⁹ 車紅梅：〈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疾病情結」〉，《文藝爭鳴·理論》(2005年1期)，頁73-76。

嘲諷了話語權力運作中的暴力本質。《文明與瘋狂》指出，話語(discourse)為社會或文化駕馭其成員思維、行動和組織的規範或條例。一個時代有政、經、文、教、醫、商等層面的話語，接受該時代對對外在世界的認知模式，由此衍生為「知識領域」(episteme)。話語建立於發話者(立法當局、社會輿論、傳統禮教等)和聽眾(社會成員)的關係，在訊息傳遞中暗含權力的施加和承受。至於「宗譜學」(genealogy)是「考掘學」(archaeology)的修正和深化，追溯某一人文現象的衍生過程、發展侷限等，藉以烘托出知識、身體和話語間相互為用的複雜關係。傅科認為身體也有個政治結構，為各種權力衝突最劇烈的場所。⁴⁰

陳曉明主張由身體寫作揭示歷史造成人性的壓抑和覺醒的對立過程，此乃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傳統之一，例如，張賢亮《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身體書寫為八〇年代中期反思文革的代表性作品。身體書寫所展示的歷史記憶是否能還原創傷的慘痛性？抑或作為抹去歷史創傷的心理補償？書寫身體乃出於對歷史和現實的雙重焦慮和恐懼，閻連科企圖將身體置於歷史中，並在歷史中思考身體，或以身體思考歷史。⁴¹身體涵蓋三面向：表現慾望的肉身；展示意念的神識；呈現政治、社會、文化等的體制。身體的三面向無確切區隔的疆界，而是相互滲透以成就完整的個體，但因作者著重的向度不同，使得三面向輕重有別。例如，閻連科《堅硬如水》、《為人民服務》等書寫情慾的身體具有政治身體的荒誕性和隱喻性。閻連科小說中描繪身體在鄉土空間、城／鄉空間、病理空間中所顯示的存在意識，不侷限於近年女性主義推波助瀾下的慾望身體，而在「肉身和神識」、「個體和體制」、「情意主體和文化主體」⁴²的身體表裡關係中，建構出流動

⁴⁰ 王德威：〈淺論傅科〉、〈「考掘學」與「宗譜學」〉，輯入米歇·傅科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2001年初版)，頁13-66。

⁴¹ 陳曉明：〈身體的荒誕計畫——論當代小說中的「文革記憶」〉，頁10-28。

⁴² 鄭慧如由神識、肉身和體制三向度的內外之別，作為闡述台灣九〇年代新詩中身體論述的脈絡，雖然學界對身體詩暫未達成共識，但鄭慧如認為此三向度能有效地掌握身體詩的精神和意義。雖然鄭慧如的關注點在於九〇年代的台灣新詩，但筆者認為其所揭舉出的三向度已精要地涵融身體論述的內外層面，故本文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的身體書寫時，乃借用鄭慧如提出的神識、肉身和體制三向度，啟發本文的論述基礎。鄭慧如：〈一九九〇年代台灣身體詩的空間層次〉，輯入李豐懋、劉苑如主編：《空間、地域與文化——中國文化空間的書寫與闡釋》(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所，2004年2刷)，頁458。

的身體空間層次。閻連科早期至今的小說創作所描繪的身體隱喻或換喻，值得深入地詮釋和探究。誠如陳曉明所言：「只要看看閻連科的寫作史，那就是一部寫作的悲劇史，更確切地說是身體的寫作悲劇史。」⁴³

閻連科小說中鄉土書寫裡農村中勞動人民的身體資本，較缺乏教育及其他場域提供轉換身體資本的價值或機會。相對地，上層社會(upper class)身體的象徵價值較能獲得充足的資源，轉變為社會、文化資本。誠如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的社會再製理論所強調：附加在特定身體形式上的象徵價值可以變動。⁴⁴農民在超穩定的宗法結構和農村場域中，缺乏教育場域提供扭轉身體象徵價值的可能時，什麼信念使其安於作為鄉村裡的勞動身體？若不，透過什麼方法轉換身體的象徵價值？例如，〈鄉間故事〉描述連科和三姑女分別如何工於心計地規劃透過婚姻作為轉換身體資本的途徑。三姑女和連科因不甘於農業勞動的身體價值，使其儘管非出於愛慕，甚至有些厭惡婚嫁的對象，卻僅因對象的父親為鄉長或支書，能使其在機構裡任職而擺脫莊稼的身體，便能毫不猶豫地應允婚事，呈顯出婚姻僅作為身體資本轉換的利益跳板。因此，閻連科鄉土書寫展示的核心不在於農民是否能夠轉變身體的象徵價值，而是在意圖轉換身體價值的過程中所呈現幽微而複雜的情感狀態下，如何轉譯身分認同，進而建構存在意識。

作為城市成員的個體亦能具體地改變該空間的象徵意涵，使身體與空間彼此相互定義。本文第貳章探討閻連科小說中鄉土書寫裡，宗法制度又如何規範身體以符合農村的穩定結構？在宗法制度下，能安於勞動的身體價值嗎？以什麼籌碼和心思改易身體的象徵價值，掙脫資源有限的農村？至於，陰陽越界的鬼魂身體如何展開具有豐富意蘊的鬼魂敘述？本文第參章論析城市空間作為政治空間、軍旅空間、情慾空間，乃至於消費空間時，來自鄉村空間的農業勞動身體，在政治、經濟、消費、慾望等場域的拉鋸抗衡中，身體的象徵價值如何轉易？身體具有什麼複雜的隱喻意涵？身體象徵價值的轉易過程中，家／國意識的流動狀態為何？至於本文第肆章則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疾病書寫裡，病理空間和罹病身體彰顯政治和文化體系所糾葛的意涵。神話－儀式－慶典展演了國家寓言中由原始

⁴³ 陳曉明：〈身體的荒誕計畫——論當代小說中的「文革記憶」〉，頁 19。

⁴⁴ Kathryn Woodward 編，林文琪譯：《身體認同：同一與差異》，頁 123-125。

思維形塑具有集體無意識內涵的「原型」身體。第伍、陸章由鄉土、空間與身體三向度，總結閻連科小說在中國現當在文學中的地位和價值。

二、 研究架構

本論文共分六章：第壹章說明研究動機、問題意識、研究價值和研究方法，並整理閻連科小說的相關研究文獻。第貳、參、肆章分別論述鄉土空間中的身分認同、鄉／城空間中家／國的意識流變、病理空間中的生／死意識和歷史創傷，以期彰顯閻連科小說中的存在意識。第伍章則梳理閻連科在中國當代小說史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第陸章為全文的作總結。下文詳述各章節研究內容和架構。

本文由鄉土、空間與身體三向度切入，闡述閻連科小說中的存在意識，旨在揭示小說中體現出人存在的意義和方式，進而探究個人與世界的關係，包括鄉土空間中呈現的身分認同、鄉／城空間中流動的家／國意識、病理空間所展演的生／死意識和歷史創傷。本文預期成果有五，概述如下：

首先，本文第貳章以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為地理體系，例如豫西耙耨山脈，論析鄉土空間中如何以宗法或原始思維規範身體，身體在鄉土空間中又如何建立身分認同，此中反映什麼文化或心理特質。

其次，筆者認為固然閻連科的小說質疑、批判了商品經濟和文明未必能對人類理性有正面的啓蒙意義，但本文第參章著墨於鄉土空間中的人們面對城市空間的政治場域、消費場域、經濟場域時，村民處在城／鄉空間中存在意識如何發生幽微的流變狀態，而非僅止於關注小說中城市造成人性的負面影響。

其三，因為關於軍旅小說創作的研究成果並不多。但本文試圖由鄉／城空間的視角剖析農民軍人在家／國意識中對黨國、權位、金錢、兩性的心理狀態，此皆涉及了人最深刻的存在意識。本文並試圖進而比較前後期的軍旅系列在創作上的繼承和轉變。

其四，閻連科疾病書寫的修辭策略和主題既承繼五四文學，也有創造性的轉化。本文以「病理空間」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特殊的文學現象，病理空間是閻連科因關懷人類生存狀態而創造出的文學空間，丁莊、受活村、三姓村等集體罹患疾病的村莊蘊含著複雜而糾葛的政治、文化、慾望、知識價值等體系，讓閻連科小

說中的疾病書寫具有豐富的隱喻內涵。

最末，閻連科的小說議題既具傳承鄉土文學傳統的特質，又能關注當代議題，更在小說形式上進行實驗性的嘗試，故本文在梳理閻連科小說的生存意識之餘，亦嘗試探討閻連科的文學創作受到哪些新時期文學思潮或西方美學的影響，以及閻連科的小說創作在現當代文學發展脈絡中的地位、啓發意義和重要性。

第三節、文獻與研究成果

許多研究者都十分關注閻連科鄉土書寫中人與土地的關係，及其中呈顯的鄉土文化、鄉土歷史，乃至於再現人與鄉土的精神關係，這些確實是閻連科小說中重要的議題，故本文第貳章論述鄉土時，由宗法制度對身體的束縛、陰陽越界的鬼魂敘述，再現閻連科鄉土小說中的存在意識。大陸學界討論閻連科小說中的鄉土情結時，尤其強調其中呈顯對苦難的關懷，此論點佔據閻連科小說研究的絕大部分。筆者認為與其說是對苦難的關注，不如躍升至生存意識的層面來探索。

梁鴻〈閻連科小說創作論〉⁴⁵對閻連科四個系列的創作進行點評，其中尤挖掘鄉土人性對瑤溝系列予以中肯詳實的評價。林舟〈歌哭與守望——讀閻連科的鄉土小說〉⁴⁶指出，閻連科批判和依戀鄉土的複雜心態，並以民風民俗強化了鄉土色彩。柳建偉〈立足本土的艱難遠行——解讀閻連科的創作道路〉⁴⁷表示，閻連科不同於以魯迅、沈從文為代表的鄉土文學傳統和以福克納為代表的西方鄉土作家，形成的另一種鄉土文學傳統，使其創作的鄉土本質逐層顯現。

陳學智認為閻連科小說中出現明顯的神秘主義氣息，如富有意蘊的象徵情節、安排鬼魂出現並參與凡間人事、以幻覺或夢境等傳統手法渲染神秘氣氛等，但陳學智僅止於陳述文本現象或小說內容來說明閻連科小說的神秘主義氣息，最後擴大地論述了二十世紀九〇年代後期出現了許多小說，皆與閻連科的小說一樣，具有濃厚神秘色彩的原因，原因包括了歷史傳統的傳承、商品經濟或科技理

⁴⁵ 梁鴻：〈閻連科小說創作論〉，《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4年3期)，頁37-42。

⁴⁶ 林舟：〈歌哭與守望——讀閻連科的鄉土小說〉，《當代文壇》(1997年5期)，頁25-27。

⁴⁷ 柳建偉：〈立足本土的艱難遠行——解讀閻連科的創作道路〉，《小說評論》(1998年2期)，頁30-35。

性發展的衝擊帶給人類的影響等。⁴⁸筆者認為陳學智由神秘主義的視角觀察閻連科小說是十分具有創見的切入點，可惜只簡要地敘述小說中的神秘事例或現象，卻未更具學理地說明何謂神秘主義，亦未更進一步論述閻連科小說中神秘主義的意義。最後以九〇年代的小說談神秘主義的原因也失於空泛，也未交代究竟是哪些小說和閻連科的小說一樣具有神秘主義的特質。因此，筆者認為閻連科小說中以夢、幻境、鬼魂等修辭策略是否可稱作是神秘主義仍有待商榷，本文會以神話學或人類學中的原型、儀式、慶典、神聖空間、原型時間等概念，輔以論述閻連科的小說中的創作手法和意義。關於原始思維建構身體象徵價值的部份，筆者由神話學或人類學中儀式、慶典、神聖空間、原型時間、再生與回歸、交感巫術等原始思維，輔以論述閻連科的小說中的創作手法和意義。

目前蒐集的期刊中，焦紅濤亦提出以神話學的觀點論述閻連科小說的審美特徵和敘事美學。例如，以樂園將毀／被毀的神化原型探討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位置；或以大禹治水、女媧補天、開天闢地的中國神話原型來說明閻連科小說中的人物，如先爺、尤四婆、司馬藍⁴⁹等洋溢著強烈的生存慾望。此外，三姓村民、尤四婆、先爺、藍四十透過「犧牲——祭祀」⁵⁰的象徵性儀式化行為來消災禳凶，達到心靈淨化的功用，因儀式於神話學裡具有巫術的功能。例如，藍四十性服務象徵權力的盧主任，此犧牲象徵古代處女的獻祭。筆者認為焦紅濤「犧牲——祭祀」的論點十分敏銳，但對文本的梳理則稍嫌疏略，故本文繼承「犧牲——祭祀」的視角，試圖更細膩地爬梳閻連科的小說。至於焦紅濤由《舊約》提出的部分論點，筆者將再作斟酌和商榷。

此外，許多研究者認為閻連科的鄉土小說過度地抗拒或詆毀城市中的文明，以及經濟對鄉土中人性的負面衝擊。例如梁鴻和李宏、程艷華等，其論點概述如下：梁鴻由地理世界的觀點談閻連科小說中的耙耨山脈是具封閉和對立性質的。閻連科虛構的耙耨山脈，富有獨特的地域色彩、語言系統、時間觀念和生存群體

⁴⁸ 陳學智：〈閻連科小說中的神秘主義氣息〉，《南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卷4期（2003年4月），頁73-74。

⁴⁹ 先爺、尤四婆、司馬藍分別是〈年月日〉、〈耙耨天歌〉、〈日光流年〉中的主人公。

⁵⁰ 焦紅濤：〈由《日光流年》看閻連科小說的敘事美學〉，《平頂山學院學報》21卷3期（2006年6月），頁28-31。

結構，影響著小說的審美特色和價值。耙耨山脈涵融強烈和複雜的隱喻性，乃詹明信提出的第三世界文本為民族寓言，此中涉及了民族精神、道德倫理、權力鬥爭等相關命題，故耙耨山脈的想像是對整個中國現當代歷史進程賦予了複雜的隱喻而在鄉村中展現，蘊含著鄉村與現實、歷史、當代政治間糾葛的複雜關係。但梁鴻認為閻連科小說中一味地否定和批判文明的進程並不能真正說明問題，反而預設了思路、命題和結論，使小說的社會批判過於單一，束縛主題的多向發展。⁵¹同樣地，李宏、程艷華認為閻連科耙耨山系列的寫作基調和創作母題，與親緣關係、政治利益、經濟利益所環環相扣的宗法結構有關，其中涉及權力與陰謀、困苦與死亡的母題，因此耙耨山是閻連科生命的家園和精神的煉獄，因為閻連科的小說始終對城市或現代文明有意或無意地抗拒或批判，而回到耙耨山脈裡建構屬於他自己完整而獨立的耙耨世界。⁵²換言之，李宏之所以以精神煉獄和生命家園注解閻連科小說的創作母題，正點出了閻連科小說創作上的特色和侷限，也是梁鴻曾提出的看法。筆者認為梁鴻對閻連科小說的褒貶相當客觀，為本文研究提供相當程度的啟發。畢竟，儘管閻連科小說在當代文學史上極具研究價值和意義，但其中的一些不足之處，本文也會盡可能公允地提出討論。

承上，筆者認為固然閻連科的小說質疑、批判了商品經濟和文明未必能對人類理性有正面的啟蒙意義，但本文第參章著墨於鄉民面對城市文明、政治、商業如何呈現出一種城／鄉空間中存在意識的流變狀態，而非僅止於關注小說中城市造成人性的負面影響。此研究理念詳述於研究價值和研究內容中。

另外，關於閻連科軍旅小說創作的研究成果並不多。閻連科一九九二至九四年描寫一批底層軍人的生存境況，如〈夏日落〉、〈和平雪〉、〈和平戰〉、〈和平殤〉、〈在和平的日子裡〉等，其中的軍人因多半出身是農村子弟，離開原鄉進入兵營，故仍具農民身分和性格，因此朱向前名為「農民軍人」⁵³的主題創作。農民軍人

⁵¹ 梁鴻：〈當代文學視野中的「村莊」困境——從閻連科、莫言、李銳小說的地理世界談起〉，《文藝爭鳴》，頁 76-81。

⁵² 李宏、程艷華：〈耙耨山：煉獄與家園——關於閻連科小說創作母題的闡釋〉，《長春工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 年 17 卷 4 期)，頁 87-89。

⁵³ 朱向前：〈鄉土中國和農民軍人〉，《文學評論》(1994 年 5 期)，頁 42-51；朱向前：〈農民之子與農民軍人——閻連科軍旅小說創作的定位〉，《當代作家評論》(1994 年 6 期)，頁 59-70。

的雙重身分和性格，讓研究者既可從鄉土和農民的視角關照當代軍人，亦可從兵營和軍人反觀中國鄉土的深層結構和當代農民的新動向。本文第參章由鄉／城空間中家／國的意識流變，重新審視閻連科軍人系列的小說。《為人民服務》是閻連科二〇〇五年的長篇小說，主人公吳大旺離開鄉土當兵的農民形象，是閻連科較早期軍人系列創作中的原型，農民為何想離開鄉土從軍？在鄉村時，對城市或軍隊懷抱什麼理想和想像？在軍隊中的權力鬥爭情形？爭權的動機與原鄉有何關聯？在軍中以什麼情緒思念原鄉？想念鄉土中的什麼？如何作決定和為什麼離開軍隊？回到鄉村中如何面對村民的眼光和期許？回到鄉村後，在農業生活中產生什麼不適？又如何回想軍中生活？上述議題皆在閻連科軍人小說中多所探討，故可由鄉／城空間的視角剖析人在家／國意識中對黨國、權位、金錢、兩性的心理狀態，此皆涉及了人最深刻的存在意識。此外，本文並試圖進而比較前後期的軍人系列在創作上的繼承和轉變。

目前共計二十三部大陸碩士論文研究閻連科的鄉土小說，⁵⁴主要關注的議題是鄉土中的苦難和權力造成複雜的人性心理狀態，選取的文本多半侷限在近年出版的長篇小說或部分的瑤溝系列小說，不僅對中短篇小說的關注並不整全——尤其是和平軍旅系列和八〇年代的創作，也使得這些研究較無法全面地關照閻連科創作精神史的演變。有鑑於此，本文關注的是閻連科自一九七八年迄今鄉土小說的精神系譜，由主體、病體、國體三個面向切入，聚焦在身體書寫和精神系譜的辯證視角，考察閻連科鄉土小說的創作轉化，並歸納出閻連科鄉土小說的文學特色和敘事策略，以期彰顯閻連科在大陸當代小說史中的重要地位。

⁵⁴ 搜尋「中國知識資源總庫——CNKI 系列數據庫」中「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08/07/06 流覽)